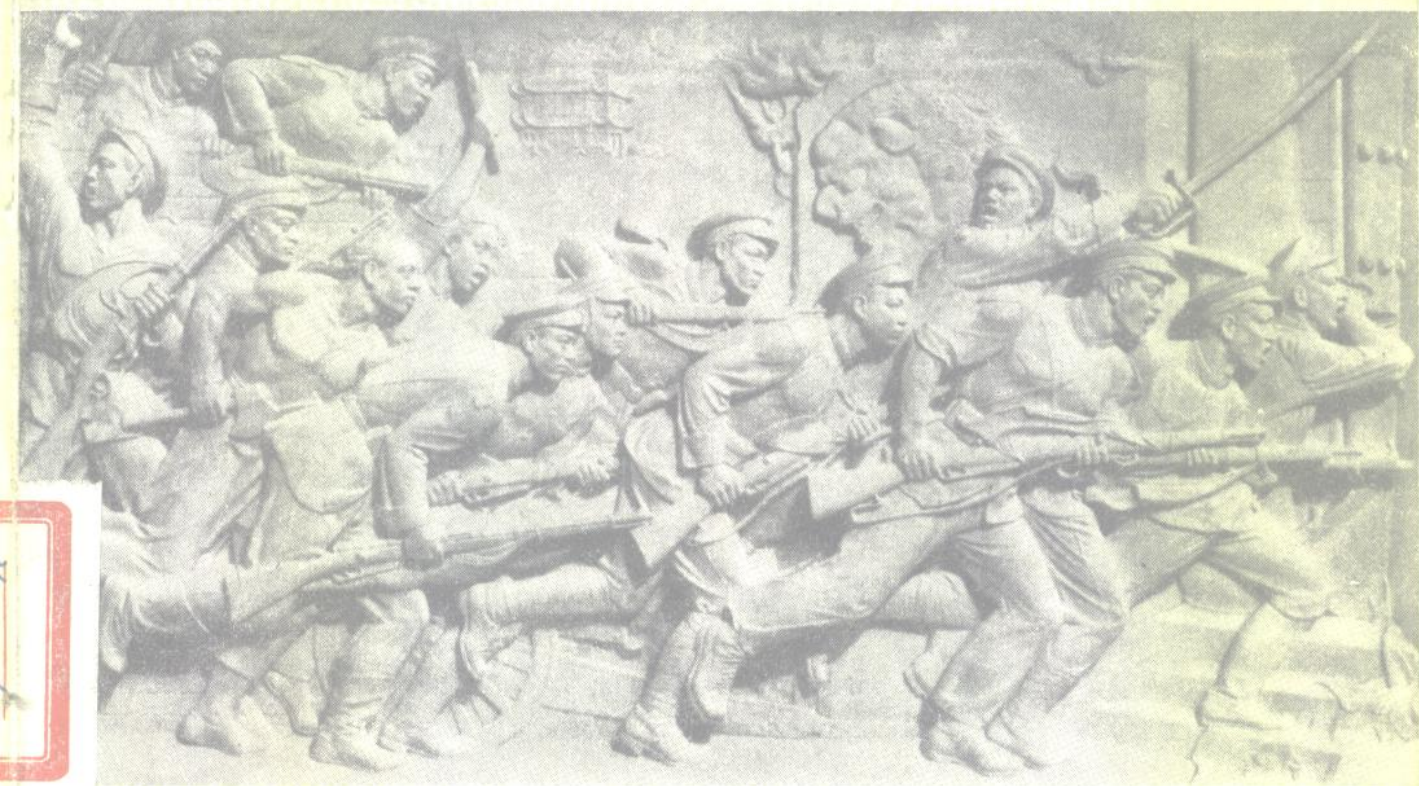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一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一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中 华 书 局

1980 年 · 北京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一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15印张·340千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200册

统一书号: 11018·840 定价: 1.40元

编 者 的 话

本刊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集刊，由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辑，目的在于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成果和刊载历史资料的园地。

凡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文、考订、史料、图片、年谱、回忆录、译文、书评以及学术动态等，欢迎投稿。来稿字数多少不拘，如篇幅较长而又确有价值者，可以分辑连载，或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丛书》出版。

来稿请写明真实姓名、详细地址、发表时的署名，邮寄“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学院转《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由于本刊无专职工作人员，来稿务希缮写清楚，并认真核实引文，以免增加发稿和校对时的困难。

本刊尚属草创阶段，编辑工作缺乏经验，错误与缺点在所难免，希望广大作者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并且不断给予大力支持。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一九八〇年七月

《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

目录预告

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张 磊
论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韦廷杰
辛亥革命前夕的章太炎	汤志钧
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	林增平
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	
——三论郑观应	夏东元
试论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	王天奖
沙俄与辛亥革命	吴乾兑
史坚如及其供词、绝笔考辨	赵矢元
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解	唐文权
“黄兴乙巳回乡历险”订谬	毛注青
黄兴与宫崎寅藏	毛注青
辛亥革命前东北人民自发斗争述略	孙克复、关捷
蒲案始末	
——记 1908 年陕西蒲城一次学生运动	张应超
犬养毅遗物中的一封孙中山手札	
辛亥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致柏原文太郎等的十三封信	
辛亥严复致陈宝琛书	
回忆辛亥	章天觉手稿
蜀党史稿	熊克武等撰 张颐眉批
革命运动还是流血事件	
——潮汕地区与辛亥革命	〔美〕爱德华·弗里曼 陶宏开译
“革命瓜分论”形成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保皇派与革命派的争论	〔日〕寺广映雄 王富山、吴雁南译
日本有关孙文文献目录	〔日〕野泽丰编 饶怀民、赵军译 王宏吉校

目 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	章开沅 (1)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金冲及、胡绳武 (11)
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	方志钦 (25)
论黄兴与辛亥革命	〔美〕薛君度 (41)
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	
——《宋教仁集》序言	陈旭麓 何泽福 (54)
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几个问题	
——学习郭老有关保路运动论述的笔记	隗藏涛 (61)
东亚同文书院和根津精神	〔日〕森 时彦 (73)
关于亚洲和亲会	汤志钧 (79)
《龙华会章程》考释	李时岳 (85)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	沈渭滨 (88)
秋瑾生年辨	毛注青 (95)
肖文遗稿《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革命军	
在长汀的失败》一文中有关福建史实的问题	范启龙 (98)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真伪	荣孟源 (112)
宫崎滔天年谱稿	〔日〕近藤秀树编 禹昌夏译 (116)
义痴六十自述	张难先著 武汉大学近代史组整理 (178)
蓉城家书	丘权政 杜春和整理 (203)
胡绍之等致胡适的信	杜春和 丘权政整理 (216)
陈天华的《敬告湖南人》和《覆湖南同学诸君书》	陈匡时 (224)
辛亥革命时期岭南学堂学生协助军政府筹饷队	段云章整理 (228)
关于《京都日报》与《爱国报》	编者 (233)

Contents

No. 1, 1980

Emancipate the Mi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Study Hard the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Zhang Kaiyuan (1)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Jin Chongji, Hu Shengwu (11)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n Yatsen and Huang Xing	Fang Zhiqin (25)
Huang Xing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USA) Hsueh Chuntu (41)
The First Martyr for the Constitution — Preface to <i>Authology of Song Jiaoreu</i>	Chen Xulu, He Zefu (54)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Protecting Road Move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Notes Taken in Studying Our Reverend Comrade Guo's Works on the Protecting Road Movement	Kui Yingtao (61)
The East Asia Tong We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Nezu Spirit	(Japan) Tokihiko Mori (73)
On the Asi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Tang Zhijun (79)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of <i>Regulations of the LongHua Society</i>	Li Shiyue (85)
New Material about Sun Yatsen's Calling on Li Hongzhang in 1894	Shen Weibin (88)
Verification on the Birth-year of Qiu Jin.....	Mao Zhuqing (95)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Fujian Province in the Posthumous Manuscript of Xiao Wen <i>the Recovery of Dapu, Yongding, Shanghang and the revolutionary army's Defeat in Changding</i>	Fan Qilong (98)
Is the <i>Manifesto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i> True or False?	Rong Mengyuan (112)
Manuscript of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ôten Miyazaki	(Japan) Hideki Kondô, Translated by Yu Changxia (116)
Yi Chi's Autobiography	Zhang Nanqian, Edited by Modern History group of the Wuhang University (178)
Home Letters from Rongcheng	Edited by Qin Quanzheng and Du Chunhe (203)
Hu Shaozhi's Letters to Hu Shi	edited by Du Chunhe and Qiu Quanzheng (216)
Chen Tianhua's <i>Advise to the People of Hunan Province</i> and <i>Letter Repling the Students of Hunan Province</i>	Chen Kuangshi (224)
The Linnan School Students Team Helping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in col- lecting Fund Durn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edited by Duan Yunzhang (228)
Something About <i>Capital Daily</i> and <i>Patriot</i>	Editor (233)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努力 研究辛亥革命史

章 开 沅

按照传统的说法,三十年为一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小的分枝,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样,也只不过经历了一“世”的发展过程。

全国解放前,除个别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做过稍为系统的研究以外,辛亥革命史主要是作为国民党党史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御用学者所垄断。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汗牛充栋的书籍和文章,其中虽然提供了某些可用的资料,但大多数论著都属于或接近于宣扬反动正统观念的官方读物,真正谈得上有点学术价值者寥寥无几。

只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才开始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三十年来,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五十余种,资料三十余种,论文六百余篇(不包括纪念性文字和回忆录)。应该强调的是,1957年以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的《辛亥革命》一至八册和《民报》影印本等重要资料的相继出版,1961年以后全国政协主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至六集和各省(自治区)、市、县的专题性回忆录及资料的陆续刊行,特别是有吴玉章、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亲自参加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的问世,对于这门年轻的学科都曾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回顾过去三十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列宁和毛主席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已经成为在这个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由于逐步加强了对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对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对于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的探讨,特别是对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斗争史实的发掘和阐明,使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步摆脱了中外反动阶级的消极影响,开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人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以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在经济背景和阶级性格,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纲领,黄兴、宋教仁、张謇等历史人物,新军和会党,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前夜思想领域的斗争,各地规模较大的群众斗争,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破坏等等方面,都取得了虽然是初步而毕竟可喜的进展。1961年吴玉章同志《辛亥革命》一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超越了个人回忆录的范围,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辛亥革命全过程的尝试。总之,各种迹象都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日渐兴旺,本来有可能在六十年代之内出现一次较大的突破。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理论权威”推行的极左路线的破坏干扰,辛亥革命史和整个历史学以至全部社会科学一样,正常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本来就比较年轻而又

为数不多的研究队伍也遭到严重的摧残。1974年以后,辛亥革命史更被“四人帮”纳入所谓“儒法斗争”的框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混乱不堪。只是在1976年秋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辛亥革命史才又一次得到了解放,中断十年以上的研究工作才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非常需要而且也必定能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在这个领域的流毒,至今仍然是需要花费很大气力的当务之急。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

首先,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诬陷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

林彪、“四人帮”出于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极端仇视历史上一切民主的因素。为了给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炮制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他们装出左得无可再左的姿态,抡起“立足于批”的大棒,向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胡乱敲打。他们不区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不区分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也不区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一概要“立足于批”,一概要推翻打倒。于是,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评法”的幌子下为许多已经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和文化专制主义大唱赞歌,顶礼膜拜;一方面却在恰恰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领域中刮起一片“否定”风。无论是西欧的启蒙思想家,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统统成为骂倒的对象。启蒙变成了“蒙蔽”,先行变成了“反动”。在“四人帮”的眼睛里,整个历史都是颠倒的。江青用慈禧太后的腔调,大骂孙中山是“牛鬼蛇神”,看来荒诞不经,其实正是他们那种极端反动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自然流露。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日子里,如何正确评价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问題以至辛亥革命史研究竟然成为“禁区”。你要肯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作用吗?“资产阶级中心论”的棍子就要劈头打来。你要强调同盟会的领导决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吗?“资产阶级决定论”的帽子就要扣在你的头上。你要赞扬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吗?又得担心被罗织以“资产阶级高明论”的罪名。除非是用影射比附的方法来为他们大揪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效劳,一切正直的史学工作者要想进行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真是动辄得咎,寸步难行。

应该指出,所谓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应该“立足于批”,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对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当然要进行分析批判。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须透过它“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须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深入地剖析其狭隘的阶级内容;①特别是要揭露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博爱”的阶级实质,注意把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严格区别开来。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一个“批”字来概括对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全面评价,更不意味着可以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来抹煞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共产党宣言》,从某种意义来看,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无情地声讨资产阶级的战斗檄文。而马克思恰好是在这篇光辉文献中,明确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同样,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这篇重要著作中,也辛辣地嘲讽过普列哈诺夫和考茨基“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这就像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等‘资产阶级代表’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等‘资产阶级代表’拿来对比一样”。请注意,在这里,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毫不含糊地说:“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②这样看来,我们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除了批判的一面,还有继承的一面,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批判地继承。

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有它的盛衰荣辱,也就是它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这种发展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这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大进步,而且是比较奴隶制取代原始社会、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更为重要的一大进步。如果没有这个进步,就不会有近代如此高度发展的人类文明,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就会更加长期地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与愚昧之中。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这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毛主席常常用文章的上下篇关系来解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结,道理就在这里。对于那些为争取实现这一历史进步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前辈,特别是对于我国那些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以恰如其分的肯定和尊重。

这种尊重,实际上也就是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辩证法的尊重。因为历史辩证法宣告:先进的事物必然要取代落后的事物,新生的社会制度必然要战胜腐朽的社会制度;正如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也必然要取代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赢得空前辉煌的胜利。只有那些面临灭顶之灾的政治虚弱的没落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才会象害怕光明一样地害怕历史辩证法。而具有远大前程的无产阶级则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把历史辩证法作为自己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用来作为战胜资产阶级的强大精神武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理直气壮地肯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业绩,尽管他们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并且未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马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628页。

克思主义当然更要重视工农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但是决不能把这种重视与对于资产阶级曾经起过的革命领导作用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任意贬低革命领导者的办法来“拔高”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旧式农民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还处于自发状态，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提出新的明确的政治纲领，从而使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正规地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如果离开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去为工农群众争什么领导和中心地位，纠缠于什么工农与资产阶级究竟哪个高明，甚至肆意歌颂群众斗争的自发性，那只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背道而驰。如果有的同志至今还对所谓“中心论”之类大棒心有余悸，那么不妨认真钻研一下列宁的《打着别人的旗帜》和毛泽东同志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等重要著作，只有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其次，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于“四人帮”炮制的“儒法斗争”那套货色，人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四人帮”多年散布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流毒，却不是短期内所能完全消除的。所谓“路线斗争”问题就是一例。辛亥革命时期到底有没有路线斗争？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在“四人帮”横行史坛的那些日子里，“路线斗争”竟成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绝对精神模式。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于历史上任何事件和任何团体都要“找出”路线斗争，如若不然就会被讥诮为“路线觉悟不高”。于是，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被戴上“正确路线代表”桂冠的历史人物一切都好，很难说有什么错误；被挂上“错误路线代表”黑牌的历史人物则什么都坏，很难说有几分正确。历史果真是这样简单划一的吗？当然不是，就拿同盟会来说，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其内部政治派别的分化又不甚清晰，因此就没有能够在党内出现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路线斗争。孙中山当然无愧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这决不等于说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是正确的。黄兴、宋教仁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宣传组织和武装起义方面，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实事求是地说，同盟会就是以孙、黄为轴心创建的，而宋教仁对于长江中下游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其独特的贡献。至于以后同盟会的改组为国民党，南京临时政府的向袁世凯交权，那都反映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走向妥协的政治总趋向，而且在关键时刻都曾得到革命主要领导者的同意。因此不宜归罪于一、两个人，不能把黄、宋的功劳统统记在孙中山的账上，更不能把孙中山的过失尽量记在黄、宋的账上。过去一些国民党史书，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或作者的自我吹嘘，往往以兴中会系统或所谓孙中山的“嫡系”作为“正统”，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作过许多歪曲或掩盖，以致在许多地方贬低或丑化了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我们在运用这些文字材料时特别需要注意鉴别，否则就很容易上当，甚至竟会以此作为说明所谓“路线斗争”的依据。

当然，我们并非否认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内部确实存在着各种政见分歧，而只不过强调对于这些政见分歧的剖析和评价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把一般的政见分歧夸大成为“路线斗争”。同时，即令是对于这些政见分歧本身的谁是谁非，也需要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象“四人帮”那样“以人划线”，把凡是不同于孙中山的见解和主张都说成是错误的。以兴中会为例，杨衢云诚然毛病很多，而且确曾与孙中山争夺过首领地位，但这决不等于说他和辅仁

文社对香港兴中会总部的建立和发展毫无积极作用，更不能因此就抹煞杨衢云一贯主张建立共和国的明确立场。光复会后期的实际负责人陶成章错误更大，他对孙中山的人身攻击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然而孙、陶两人在军事路线上的分歧却很难说谁是谁非，因为同样都具有脱离群众和单纯军事冒险的致命弱点。总的说来，孙中山确实在政治思想上高于侪辈，而且具有很多作为革命领袖的优秀品质，这些都是为当时革命人民所已公认，也是后世向有定评的客观事实。因此，就无需用贬抑他人的办法，来对孙中山增加许多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死者无言。历史人物是不可能为自己申辩的了，然而广大读者却完全有权利向历史学家要求“公道”二字。

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想界代表人物的情况更为复杂。以《猛回头》、《警世钟》而风靡一时的陈天华，居然对改良主义还抱有幻想；而以后确实堕落成为叛徒的刘师培，恰恰又是激昂慷慨的《悲佃篇》的作者。至于以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的胡汉民，成为汉奸卖国贼的汪精卫，在《民报》时期都曾经是孙中山倚重的理论骨干，并且写过许多抨击改良派的有声有色的论战文章，这更是人所共知的一段往事。即以聚集在《国粹学报》周围的这帮人来说，表面好象都是迂腐不堪，而内部政治趋向却并非完全一致。其中不少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采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有的甚至公然以欧洲文艺复兴在东方的继承人自居。对于这些人，就很难简单地统统都扣上一顶封建顽固分子的大帽子。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更需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曾经出现过的无政府主义，那完全是一种反动的思潮和派别。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信奉无政府主义，则往往是出于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愤激。他们吹嘘无政府主义是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宣传，但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揭露与批判决不是毫无积极作用。这些人一味鼓吹暗杀和笼统反对政府，当然应该加以分析批判，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是有两面性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引导。我们不能把这些人于《新世纪》的头面人物李石曾、吴稚晖之流混同起来，李、吴的表现更接近于资产阶级政客，虽然也满口普鲁东、克鲁泡特金，但对时髦的追求似乎更多于实际的工作。至于那些自称接受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并非同道的爱国志士，更要另作别论；他们为革命艰苦奋斗、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应该受到必要的肯定和表彰。

总之，历史的本身是极端错综复杂的，决不能用“一锅煮”、“一刀切”的办法来评说历史人物，而必须把他们的言论和实践，放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中间，深入地进行考察辨别，然后才能判断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表现了哪个阶级、阶层的政治特点，从属于哪个政治营垒，代表哪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历史人物自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些人始终与时代一起前进，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然后又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有些人从改良派营垒中分化出来，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然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朋友；有些人的道路相当曲折，时而革命，时而反动，时而先进，时而落伍，或以革命为归宿，或以堕落终其身；有些人的变化更是大起大落，或者从革命队伍中的佼佼者蜕变为反动透顶的民族败类，或者从人所不齿的帝制余孽又终于醒悟过来，在迟暮的晚年投身于新的革命潮流……。各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写的，形形色色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是客观存在，后世的史家可以用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加以剖析品评，但却没有任何理由来

涂改古人的历史。人民有权利要求历史学者尊重和维护历史的真实,希望他们以严谨的笔触和犀利的识见,如实地勾勒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各个时代各种类型人物的形象或特写。历史学者决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而且还要充分相信人民的智慧,相信人民能够对于历史上的是非正邪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爱憎。我们的责任是帮助读者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且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毫无疑问,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一定能够通过历史人物不同的生活道路的对比,引出必要而有益的结论。

对于立宪派人物的评价问题,多年以来也成为一个人人望而却步的“禁区”。因为,按照“四人帮”影射史学的逻辑,立宪派既然反对暴力革命,那就等于是现代修正主义;而对修正主义是不能一分为二的,立宪派的活动也就无任何积极作用可言。把历史舞台出现的人物,简单地分为“好人”、“坏人”,甚至企图归纳成为只有两种颜色的脸谱,这诚然是一种非常节省气力的办法,但毕竟具有童年时代极为幼稚的思维特征,与历史唯物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立宪派与现代修正主义,两者的阶级基础各不相同,而且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因此不应该在他们之间划等号。政治派别的区分必须以阶级区分作为根本依据。我们决不能既承认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或者是多少已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士绅的政治代表,同时却又完全否认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存在着矛盾。极为浓厚的妥协性决定了立宪派对于群众革命风暴的十分仇惧,因而鼓吹君主立宪方案以对抗革命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对此当然应该给以揭露和批判。但是他们毕竟区别于买办阶级,在各地收回利权和保路运动中,与帝国主义以及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存在着明显的利害冲突。就是在各地谘议局的活动,立宪派与各省督抚也并非都是亦步亦趋,而是也或多或少表现出各种矛盾。如果进一步考察起来,立宪派的成员本身就很复杂,经济、政治地位和对时局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需要对他们的言论和实践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处理办法。即使是梁启超这样的立宪派挂帅人物,而且早已堕落成为保皇党,因此理所当然地为革命派所深恶痛绝,被认为是“为虎作伥”,“直禽兽之不若也”。^①但是,他在《新民丛报》对于西方近代文化的介绍,在文学和史学方面所进行的革新探索,是否也起过某些进步作用?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慎重研究。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在政治实践与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思想之间简单划等号的办法,也是不足取的。(当然,这并非说不需要重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

应该承认,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凭谁定是非”?当年林则徐谪戍新疆时的沉郁喟叹,一个多世纪以来曾经扣动过多少文人骚客的心弦?但是,任何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学问家都不可能提供正确的回答,因为阶级的偏见模糊了他们的眼睛。只有眼光远大胸怀广阔的无产阶级,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①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制作的“崇洋媚外”帽子满天飞,使得人们不仅讳言今天的国外援助,而且也讳言历史上的国外援助。时间早已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竟然出现过某种程度笼统排外的倾向:凡是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几乎都是侵略分子;凡是介入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别有用心,仿佛革命越孤立就越单纯越好。这样的看法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历史的事实是,由于好几个世纪以来外国资产阶级的“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世界到二十世纪初年早已被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都不可能是绝对孤立的,都必然要与某些外国政府、政党和个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给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不能采取回避态度,更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简单作法。

辛亥革命也不是在一国之内孤立进行的,它不仅得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有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支援,甚至还建立过亚洲和亲会之类带国际性的反帝团体。当然,对于这些事情,评价并非很难。比较复杂的是欧美和日本,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界和民间人士,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辛亥革命。过去,人们担心惹起麻烦的,多半是对于这些事情的评论。其实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早已讲得很清楚,不仅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来,而且还要把这些政府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同决定政策的人们区别开来。至于一个人的国籍,决不能说明他在政治上的进步或反动,更不能说明他的活动对于中国革命的促进或破坏,关键是要认真考察他的主要社会实践及其产生的主要效果。

以日本的宫崎滔天为例,他出生于一个多年从事民权运动的进步家庭,弟兄几人都参加过争取民主和土地复权运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孙中山能够在日本立足,而且很快在国内外扩大自己的影响,与宫崎一家的帮助和宣传是分不开的。宫崎滔天写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及其中译本,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为了援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宫崎东奔西走,倾家荡产,甚至穷得以到处卖唱糊口,还要抚养黄兴委托给他的儿子一欧,以后又送一欧回国参加武装起义。正当宫崎穷困潦倒的时候,日本警察当局曾以金钱诱惑,想收买他监视革命党人的活动;宫崎大义凛然,愤怒地断然加以拒绝。这些事迹不仅当时使孙中山、黄兴等深受感动,就是现在和今后也依然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史上的佳话。过去有的辛亥革命史作者之所以不提这些事情,可能是考虑宫崎与日本外务省及黑龙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是在那样的历史环境里,宫崎有过这样一些社会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怎能有那么多清澈如水、纯之又纯的政治性人物?重要的是他并非日本政府的决策人物,甚至也谈不上是什么普通工作人员,终其身连一个众议员也竞选不上,而他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则始终是友好的。当然,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政策对宫崎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他所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确实包含着日本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容易与侵华势力所散布的“中日提携”之类伪善舆论混淆起来,但这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对于日本社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国作者过去也大多忽略或有意回避了。实际上,日本社会党中央机关刊物《光》,从1905年正式出版以后始终对中国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它的第7期(1906年5月)曾特地刊登《欢迎〈民报〉》一文,为同盟会的宣传活动擂鼓助威。有的作者可能过于强调了当时的日本社会党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为它既受欧

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容纳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某些成份,而幸德秋水出狱后又大量宣传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现和比较趋于成熟,都需要经过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我们没有理由对幸德秋水这样真诚的革命者提出过苛的要求。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之类活动中,幸德秋水、堺利彦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东京同盟会本部中的泛滥,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鼓励与声援却是极为真挚的。“祇教文章点点血,流作樱花一片红”。当年中日革命志士之间的战斗友谊,应该受到后世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除了这些日本朋友以外,其他如康德黎、孟生、穆克林等欧美友好人士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同情和帮助,也应当加以肯定和赞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忘记那些在黑暗岁月里向中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的国外的善良的人们。当然,也应该看到,历史现象毕竟是复杂的,介入辛亥革命的还有许多口蜜腹剑的假朋友。象内田良平那样的人,尽管同盟会最初是在他的家里筹备成立的,以后又曾多次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但他确实是满脑袋帝国主义思想,并非真心支持中国革命,因此与宫崎等人应有所区别,不宜同样看待。还有一些外国人,更为明显的属于帝国主义政府的工具或暗探,我们需要注意揭露其政治背景,千万不能为他们冠冕堂皇的言词所蒙蔽。

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或政界中的上层人士,也要进行深入的具体的分析。侧重点当然是揭露他们的侵略政策与反动本质,但是也不能忽视这些人中间可能存在的差别。因为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是极为复杂的,而且往往是瞬息万变;统治阶级不会始终是铁板一块,其中也可能出现若干有识之士主张采取比较明智的政策。对于这些人,当然首先需要分析其阶级实质和政治意图,但也有必要过细地研究他们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交往,适当肯定其积极作用,不宜与那些极端分子混为一谈。

总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我们自己工作上也有着缺点,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甚多。上面仅仅概略地谈到其中三个问题,目的无非是强调首先必须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提高我们对于历史的客观性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要尊重历史真相。有没有客观存在的历史?能不能认识和说明历史的真相?在这些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唯物历史观与唯心历史观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强调社会物质生活(即社会存在)的第一性,强调社会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精神生活则不过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尽管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社会精神生活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各种矛盾着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构成了历史纷纭复杂的特点,但归根到底还是物质生活生产条件提供了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客观基础。列宁早已说得很清楚,如果离开这个“基本前提”,“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①但是,许多年来,人们不敢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不敢强调社会运动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客观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不敢强调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因为害怕被扣上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帽子。结果,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伟大祖国历史被“四人帮”糟蹋得不象样子,任凭他们歪曲、涂改、捏造,“古为帮用”,流弊无穷。这样沉痛的教训,不能不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并且需要加以切实的改进。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强调党性的,它必然要在全部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中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但是这种党性又是建立在对于大量客观历史事实进行科学地研究的基础上的,决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党性与科学性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应该看到,如果离开了科学性,如果从根本上忽略了或否认了历史的客观性,那么历史科学的无产阶级党性也就必然流于一种主观愿望,甚至会成为一堆毫无用处的废话。需要经常想起恩格斯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其所以要求“多年冷静钻研”和依靠大量经过考订的确凿史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贯串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满着斗争、依存、制约、渗透、转化,偶然性体现着必然性,本质又往往隐藏在现象后面,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因与果、主流与支流、形式与内容、统一性与多样性种种关系,真是错综复杂、迂回曲折、扑朔迷离。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充分占有可靠的资料,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途径潜心进行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掌握历史发展的“全部总和”与“有机联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揭示客观存在的历史发展规律。当然,这决非短时间所能奏效,需要多年勤奋而严肃的科学工作,侥幸取胜的“捷径”是不存在的。

建国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对于辛亥革命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与浩如烟海的全部辛亥革命史资料相比较,这不过是很小一部分,还有大量档案、文献、报刊、手稿至今没有得到整理和利用。日本外务省、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等外文档案,也都收藏着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珍贵史料,许多海外学者已经加以利用,提供了不少颇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而我们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就是对于国内已经发掘出来和正式出版的资料,也大多没有经过“批判地审查”,不象太平天国史研究那样有多年的史料考订辨伪工作作为基础。姑且不论清方文献如何对辛亥革命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就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报刊也充满着不准确甚至伪造的新闻报导。革命方面的原始文献当然比较可信,但民族资产阶级即令在上升时期,业已表现出并不缺乏作伪的本领,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所发的公报,其中有的消息就是为了鼓动人心而关在房里制作的。革命领导人和一些重要骨干亲自写的回忆录,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党同伐异,自我夸耀,文过饰非,在所不免,由于时隔多年而回忆失真的情况更比比皆是。这就需要我们以更为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资料工作,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进一步开展史料的征集、整理、校订、出版、考证工作,切切实实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打好基础。

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必须力求完整、准确地领会有关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武器,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那些见木不见林的学者,可能对单个的制度、事件、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历史事变的总体则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但是,如果单纯向经典著作寻找有关结论,也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竟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研究,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把理论与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客观规律。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现状来说,当前特别要提倡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争取写出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专题性著作,力求改变过去那种出版物以泛论性的小册子为主的弱点。即以对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的研究而言,当然需要继续对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中下层作深入探讨。但是,要想使这种研究取得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就不能再停留于不分行业、地区的“一揽子”式的考察和论述。要认真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他们对于欧洲英、法、德等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分别研究了各个地区资产阶级的特点,而且还着重分别研究了金融、工业、商业等各种类型资本家在阶级性格上的差异。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也早已强调指出:“我们调查商人成份,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免粗略,那么今后就必须这样认真、细致、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以外,行帮、公所、会馆、商会、商团、码头、集镇等等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也只有这样逐步弄清各个侧面,我们才能对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动向作出更为深刻的科学的说明。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缺少出版一部全面的通史规格的辛亥革命史大著作的必要基础。必须首先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专题研究中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辛亥革命史,写出“证据确凿”和“胜于雄辩”的学术名著来。

辛亥革命史研究还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提倡不同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通过相互辩驳、相互校正、相互补益,来发展正确的东西,改正错误的东西,深化对历史事物的认识,繁荣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要切实改变过去那种等待上面出题目、对好口径做文章的消极沉闷局面,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术上的胆略和勇气。辛亥革命史的内容极为丰富,研究课题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我们应该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新领域、发掘新资料、研究新课题,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开辟研究工作的新天地。在研究方法、论述风格、文章体裁以至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也应该鼓励发挥各家所长,形成多种多样的家法和路数,促进史学园地真正出现一个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有利于新生力量的成长,才能使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学术作出更多的贡献。